

移植 与 异化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杨绪盟 著

人民出版社

移植 异化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浙江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移植 与 异化

杨绪盟 著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书林瀚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杨绪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

ISBN 7-01-005222-0

I. 移… II. 杨… III. 政党—研究—中国—民国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233 号

移植与异化

YIZHI YU YIHUA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杨绪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7-01-005222-0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杨绪盟，男，生于1971年9月，山东郓城人，先后就读于烟台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国际政治、政党政治领域有所研究。曾在《理论前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著有《朝鲜半岛危机与中美关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等。

装帧设计：徐晖

自序

从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仁人志士第一位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基础上，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又谈何容易。国人对于救国道路的探索曲折而艰辛。

面对顽固挣扎的本国封建势力和穷凶极恶的外来侵略势力，中华民族在近代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革命的先行者们站在时代的潮头，振臂疾呼，希望聚集中国的进步分子，团结广大的爱国力量，领导全国民众，推翻专制，抗击侵略，建立共和。但是，近代的社会运动和武装起义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因而，如何积聚革命内核，如何整合社会力量，便成为关键，政党随时势应运而生。

可以说，西方政党思想的传入，确实为中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近代化，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西方政党思想在中国社会逐渐被理解和掌握，也随着中国革命发展的逐渐深入，中国的革命力量需要



政党，需要政党来领导革命，中国社会也需要政党，需要政党来实现政治家们的理想。在近代化进程开始得比较晚的中国，政党终于萌发出勃勃生机。

按照通常的定义，政党本质上是社会中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进程中，以专制为主导的社会始终没有给政党一个适宜的孕育土壤和成长环境。所以，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只有朋党，没有政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在近代，它是随着西方政党思想的传入，并应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时势之运而形成的。

一般而言，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且不完全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目标。否则，这个政党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政党的政治目标一般包含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一是政权目标，即夺取或巩固社会公共权力；二是社会目标，即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在政党的类群中，不同的政党对政治目标有不同的偏好——或偏好政权目标，或偏好社会目标，则是可以理解的。

基于政党的政治目标，产生了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通过法定的途径和方式获取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政治形态。政党政治是相对于家族政治、门阀政治、派系政治等历史传统政治形态而言的一种现代政治形态。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则是通过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来合法地争夺国家执政权，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没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成为在野党或者反对

党。政党政治同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就是执政党；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事实上，学术界对“政党政治”概念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观点就是如上所述，狭义的观点则认为，“政党政治用以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合法规则、秩序和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府主要的特色之一，在民主政体下，如果没有政党，不但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也难以得到顺畅发展。所以，亨廷顿说：“一个没有政党组织的政权，既缺乏推动社会变迁和吸收变迁产生冲击的制度方法，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能力也相当有限。”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美好特性，使其当然成为了众多现代国家追求的目标。如令，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中十分普遍的形式。当今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 20 多个国家不允许政党存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都是通过政党来实施的。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是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或在革命胜利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近现代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随着公民普选权的逐渐获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政治过程，相应地，就必须有一种组织和协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有吸引力的政策以谋求公职时，政党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最早产生于欧美，其根本的原因



是当时的社会具备了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经济条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是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政治条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提出和传播是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思想条件。

在中国，政党的产生、政党政治的发育经历了与欧美完全不同的模式。考察中国近代社会，有着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也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同的特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的分析，1840年以后直到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有以下几个特征：（1）国民对地方的政治忠诚超过了对中央的政治忠诚。（2）欠缺解决冲突的能普遍接受的可行的文明程序。（3）社会团体之间政治不信任泛滥。（4）中央政府在形式上和持续时间上倾向于不稳定。形成这种社会生态的原因在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冲击得支离破碎；而所有的“舶来品”，在中国封建社会强大的历史惯性下，也被碾压而变形，几乎无一幸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毁灭了一个旧的完整性以后，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再建立另外一个新的完整性，中国近代社会在惶惶中等待着重建。

具体来讲，对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性而言，虽然几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是，它的强大势力并不会一夜间消亡，相反，它始终在垂死挣扎并且能量惊人。几乎在中国近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封建势力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时而勾结，时而对抗，妄想扼杀中国新生的进步势力。虽然西方资

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潮，已被逐渐移植到中国，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接受，就是接受了，也是异化的接受。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尊孔复古思潮，其中都隐含有中国传统封建势力顽固挣扎的极端表现。近代中国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不间断文明史，并且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领先于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大的反差，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思想和忧患意识，尤其是在一些上层的知识分子里面，这种情绪更是普遍存在。所以，在中国近代的历次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当中，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国初年，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政党对于政治的意义之所在，意识到了组建政党，实施政党政治乃是实现共和、救国救民的真正良药。所以，他们积极借鉴西方的政党思想和制度，并把它们推向中国的政治舞台。

不幸的是，中国的封建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反政党特征。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士大夫、官僚由于出身和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也会分化成不同的带有政治意义的派别，但是“使个体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环境中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修养，结果得到强匀质性而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难以形成阶级利益和意识，更不用说具有严格组织和利益要求的团体。加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君子不党’作为凝结中国传统智慧的古训广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中国封建传统的余荫下是无法形成和发展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的。

中国遭受侵略、备受屈辱的残酷现实，使得一部分先觉者



认识到了要走学习西方的自救道路。政党政治是他们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封建君王和士大夫根本无法超越他们维护传统既得利益的本能，他们妄图在已有的政治框架内完成自救。所以，尽管1911年清政府在立宪运动的最后关头，先后颁布了《实行宪政谕》与《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在名义上，政党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仅仅是对西方政党政治形式上的照搬，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民主政治的现实环境，政党政治赖以成活、发育的社会土壤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因而这些文件颁布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湮灭了。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皇权帝国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在意识形态上来自天命，在力量上来自武力的统一和控制，尤其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官僚组织系统。在这样的体制中，有组织的公开的政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过，经过很多有志之士的多年宣讲，以及政府实行的真真假假的民主改革，辛亥革命以后，西方政党观念及政党政治体制已逐渐深入人心，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参与政治的要求和激情迅即爆发，他们以为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的议会制内阁制即可实现，而议会制内阁制的运作载体必是政党，政党将大有作为。政党的合法化突破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从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政党观念，所以“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以致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民初究竟有多少社团政党，很难有精确的统计。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从大量资料中统计出，自武昌首义至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活动的各种党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就有312个。其中还不

包括自 1894 年至 1911 年出现的 193 个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真正开始公开在政治上运作，并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始于民国建立之初”，这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他开启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先河，也成为政党革命的领袖，推翻了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权。孙中山先生的政党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孙中山先生认为，政党乃是社会中的人的组织，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产物。他虽未对政党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对政党与政治体系的互动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政治，做了很多开创性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政党理论，是在他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到最后的中国国民党，历经五次改组，限于时势和经验，虽都有瑕疵之处，但每次改组均迎接历史的挑战，不断地调整与谋求响应之道，以其具有动态性的演化过程，使政党的体系结构，在不断地挑战与响应中谋求调整与适应，不但包含政党自我创新的动力，更逐渐将政党导入制度化的途径。

显然，孙中山先生是以欧美为师，努力把西方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以达民主政治的目的。孙先生一生奋斗，为国尽瘁，把政党政治和民主自由的种子播种到了中国的大地上。仅此一点，堪称功勋卓著。但是客观地讲，他所倡导的民初的政党政治只具有西方政党政治的外在形式，而在不具有西方政党政治的经济、社会条件与政治文化条件下，并没有在实质上取得成功。各政党大都按照自己传统的心理、习惯，而不按照西



方制度化了的强有力的程序规则行事。因此，有人说“民国初年仅有类西方的政党政治的表象，而无西方政党政治之实质”，西方的“民主之花”在中国彻底只能被异化为“淮南之枳”，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的厄运。章太炎在总结民国初年政治失败时就指出：“政治法律，皆依习惯形成”，而中国的情况则是“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不为”。“横取”、“强施”二词道出此中真谛，道出了当时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艰难。

所以，民初政党政治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用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了初生的民主共和，中国那些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但是，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固然有为袁世凯所破坏的原因，同时也有脱不开封建传统而自沉的原因。撇开多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仍沉睡在臣民观念之中不论，就当时的众多政党而言，国会失败，他们亦随之销声匿迹，除了国民党为袁强迫解散外，其他皆自行消散。国会恢复后，一些政党领袖竟然也无心于政党政治：梁启超出国，声称不再从政，仍愿办报，组织社团研究文化；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已不同于国民党，在民主革命接连遭到失败后，也闭门读书写作，重新探索救国道路；黄兴去了美国，组织政事研究会，不久去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西交流，较之以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宽阔和深入得多，但由于触及到了几乎中国所有的政治文化，因而只能在民族心理和社会承受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缓慢而曲折地展开。并且在中国传统强大的同化作用下，所有的来自西方的东西都不可避免的发生

不同程度的变异。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再到“中体西用”，甚至到后来的“西学源于中国说”的提出，都反映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在移植西方的同时，都在力图同化西方，可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被异化了的西方。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要不要引进西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世界潮流把握的增强，到了 20 世纪初，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声音基本上听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从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制度、文学艺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文化，1911 年民国建立后，人们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努力移植西方文化，中国就会像欧美那样富强起来。然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疯狂反攻，一度让中国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寻求和实践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政治。

青山遮不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文明曙光，也给中国的革命者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此，中国的政治发展结束了抑郁的彷徨，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号角，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发生了重大思想转变，革命党“建国”，也可以“治国”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目标可以分阶段实现的纲领基本吻合，于是，国共两党走到了一起。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为历史留下了短暂但美好的回忆。

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留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虽然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或者客观地评价历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甚至有的学者激进地认为，历史与政治一样



的肮脏，历史和政治都是当政者的把戏而已。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当权者，他们可以玩弄政治，改变历史却是难事，他们能改变的只能是对历史的评判。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个人、团体或者是政党，包括政府，对历史的理解肯定是有不同的表现的。所以，所谓的正史和野史都能为历史学家所关注。本书试图从一个相对广阔的视角，结合在特定区域内的深入探究，来论述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政治，且力图彰显其特质。但是限于作者水平，只能说，为了这个目的，我努力做了。

叨此，权为序。

作 者

2005 年 8 月 1 日

Contents



自序

第一章 清末中国政党思想的初步发育 1

一、西方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思想的输入与传播 2

1. 政党的起源 2

2. 中国人对西方政党观念的朦胧认识 6

3. 西方政党观念的输入 11

4. 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4

二、清末新知识分子的政党观 22

1. 清末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22

2.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视野 25

3.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化 29

三、清末新知识分子的组党实验 34

1. 清末社会、政治危机对政党的催生作用 34

2. 清末“党禁”的松动和《结社集会律》的颁布 36